

指月

——麻天祥随笔初集

與佛偕聖聖看江河浮日月
司僧情筆筆寫詩煉蘊真龍

麻天祥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序 一

几天前，麻天祥教授以他的《指月——麻天祥随笔初集》、《揽月——麻天祥随笔二集》见示，并嘱作序。我马上想到孔夫子的话：“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我虽治哲学有年，但于佛学涉猎极少，所知极浅，实在不敢信口开河，对麻天祥教授的著作妄加评鹭。然而翻开书稿，我立即被吸引到了字里行间，不由自主地读下去了。读到大约一半的时候，我蓦然改变了念头，因为我发现这是两部在天祥君多种佛学专著之外的特殊著作，是不谙佛学的外行也能大致读懂的，也许这两部著作的特色正在于此。我是众多的外行之一，读了也确实深受启发。既然如此，也就不妨以读者的身份谈一点感受，谈错了也无妨。于是我也不揣浅陋，欣然从命了。

我与天祥君相识不久。他来武大任教后，我们专业不同，一段时间里并无交往。一年多前由于偶然的机缘，他把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送给了我。他的艰苦经历和宏富学识使我对这位比我年轻 17 岁的学者钦佩有加，认为他是一位才、学、识具备的不可多得的学者，是一位淡泊名利、特立独行、矢志为学、卓然有成的精神劳作者。他幼年家境清寒，又遇上人所共知的艰难岁月，并无优越的学习条件。然而他以罕见的颖悟和超常的勤奋在韶齿之年就“卓荦观群书”，开始受中外典籍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他在从医 20 年之后毅然转治文史，以中国学术思想史和佛学研究为主攻方向，在张岂之等前辈学人的指导下迅速升堂入

室，进而著作迭出，成就斐然，其来有自，绝非偶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有一系列深刻的论述，至今仍是应当遵循的。但也无可讳言，过去我们对这些论述的理解和运用确有某些简单化、片面化的弊病。表现之一，就是脱离了社会的、历史的、认识论的分析，把宗教归结为或等同于迷信和胡说；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和宗教与人生的关系也只从消极方面理解。这至少不能解释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现代世界上大多数人还信仰宗教的事实，也不能解释许多涵养极高、成就卓越的科学家也信仰宗教的事实。然而要如实地解释宗教现象，树立对宗教问题的合理态度，特别是从宗教思想中发掘积极的成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构建我国和谐社会服务，为提高人的素质服务，绝非易事。天祥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佛教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独到之见。例如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着重落墨的对佛教与人生的看法，对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与教育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与科学的关系的看法，对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看法等等，都是很富有启迪意义的。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市场经济不但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提升也有积极作用，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我们并不以阴暗的眼光看待市场经济，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但是，市场经济也确有消极作用。在消极作用的影响下，所谓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难免成为许多人实际奉行的为人准则，这种准则甚至在具体知识并不欠缺的人群中也颇有市场。物欲横流、金钱至上、道德失范之风腐蚀着人们的心灵，败坏着人的素质，引发着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有些人已经不由自主地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成了贪欲的奴隶，情趣庸鄙，境界低下，堂庑扁窄，以致真假不分、善恶颠倒、美丑错位而懵然不觉，“穷得只剩下钱了”。这不仅直接妨碍了和谐社会的

序 二

麻天祥随笔初集《指月》、二集《揽月》近期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诸多学术著作之外的通俗的感怀之作。嘱我作序,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孕育了所有的炎黄子孙,我们医务工作者同样感同身受,所以并不显得陌生。加之,一则我是从老河大(河南大学)走出来的,1939年考入医学院,1945年毕业后历任助教,1949年分校后离开。河大是我的母校,为母校做事责无旁贷。二则麻天祥也曾是医学队伍中的一员,特别在眼科,使我回想起在门诊时的往事。时隔30余年,当时情景仍仿佛如昨,倍感亲切。这一擦肩而过的因缘,至今挥之不去,为他的自传性质的随笔作序,受宠若惊之余,也是兴之所至的事。

前些时,天祥和他的妻子来看望我,一下子让我想起青年孙中山拜望张之洞的故事,顺口吟出二人的对联:(张)持七字帖(指孙中山写的帖:“孙文拜见之洞兄”),见一品官,书生竟敢称兄弟?(孙)读百家书,行万里路,布衣亦可傲王侯。此事或许是杜撰,或许是确有根据,也未可知。当时并无所指,至今想来,大概也是有感而发。20世纪70年代初期,天祥在眼科那段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我们一起朝夕相处,他留给大家的印象至今难忘。在很多老师们的眼里,他不仅聪明,有才智,而且勤奋好学。只要有会,他都会跟在每一个老师的后面,学习他尚待入门的眼科知识。他什么都学,什么都做,正所谓“不因善小而不为”,

甚至每天早早上班,拖地板、擦桌子,一丝不苟。正像石礪教授对他的夸奖:通常对眼底病的诊断最少要花一年时间才能掌握,他只用了三个月。几年前我也曾由衷的感叹,天祥的转行,无疑使医学界少了一个好的眼科医生。应当说,天祥今天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聪明才智固然重要,励志、虚心、勤奋尤其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只要看到他的科研成果,看到他天涯孤旅海内外的常年奔波,就好像看到他那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无怨无悔的生命奉献!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段古训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只有苦心志、劳筋骨之后,才能承当天下大任。这恰恰是天祥学术历程的写照。经过不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在困苦中一往无前,千锤百炼,造就出祖国的卓越人才、传奇人物,于是才有了惊世骇俗之作,振聋发聩之举,终于异军突起,独树一帜,担当起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天下“大任”。孔子也说过“性相近,习相远”,世上有一些人没有太多的成就,不是因为没有志向,也不是缺乏聪明才智,或许也不是不够勤奋,只是由于习染的不同,而经不起挫折。所谓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人在逆境中自暴自弃,孤芳自赏也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人生不可能都是圆满,不可能永远充满辉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天祥则不然,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安常处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难怪台湾星云大师在他的作品中用“输得起”称赞苏轼,称赞孙中山,也称赞了天祥。我觉得星云大师说得很有道理,顺境中的成功固然值得庆贺,逆境中的崛起尤其应当予以赞赏。人要成功,就应当有天祥那样安常处顺的淡泊、百折不回的坚忍和柔韧。

我已在耄耋之年，冗碌一生，虽然也对社会做了一点事情。读了天祥的书稿，也增加了我寿在期颐的信念，考虑有生之年如何造福人类。更希望天祥和天下所有的有志者继续努力，希望我的母校繁荣昌盛。

张效房

2009年5月30日

逝者如斯

指
月

逝者如斯

校长。蹒跚的步履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愁苦的眉目间仍然洋溢着慈祥。当我像过去一样朝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的时候，不谙世事的，我，眼泪却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外面世界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儿奔来眼底，和我心里的阴影与光明融合在一起。大概就是在那一瞬间结束了我的童稚，过早地让我步入了沧桑。

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毫无疑问，对人生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这十五年。而我，早岁入学，阴错阳差，在15岁那年，我又早早地如愿以偿而及医学之门墙。就此而言，我比我的同龄人幸运得多，在横扫一切的年代之前，就完成了我的学业。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喜欢为病人解除痛苦后的那种感觉，尤其喜欢赶走死神，让垂危患者重生的那份自豪。然而，病房内的生生死死，以及面对不治之症的无奈，更让我增加了几分人生的感叹，生命的脆弱，也教我心中泛起无尽的悲哀。解剖、生理、微生物、寄生虫诸学科，教我了解了人体和病原体的结构与功能；教学、临床之实践，还引导我去了解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救治患者疾病的同时，又常常唤起我认识、消除人类疾病的知识冲动。“采撷天上长生药，医治人间短命花”，在那贬抑知识价值的年代，也是向一切渴求知识的青年人敞开通往科学殿堂大门的年代，我躲在时代的夹缝中，穿过时间的隧道，聆听柏拉图、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诸先哲的妙语。《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莫尔的《乌托邦》、马克思的《资本论》、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复活》，还有萨特、弗洛伊德，以及科学哲学、结构主义，我也都一知半解地兼收并蓄。

有趣的是，我们这一代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大多都是在口诛笔伐儒家思想的评法批儒运动中系统了解中国传统的，也是在批判孔老二那慷慨激越的呼声中开始认识孔子的。当然，我们也因此而接触了老子、荀子、韩非子等。仁者爱人、天下为公、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以及有无相成、体用一源的理性思维，弥补了我们精神上的空旷之地，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圣经》也是在那时读到的，独于佛学著作仍无缘拜识。不止是无神论的抗拒，太多的理性和现实的思维，自然孕育不出虔诚的信仰。我仅仅开始意识到，内在的道德修养，中国文化之重建，是通向理想社会的基本保障，确信在大千世界变幻纷纭的现象后面，必定有它的真实。

医海泛舟近 20 个寒暑，风风雨雨而有劫后余生之感。说不清是好胜而不甘沦落的天性，还是悲天悯人的忧患，或许是少年得志的坎坷际遇，教我在近不惑之年，对人生的道路重新作了选择。如此虽然意味更新，却也难免失落。它既需要十倍于通常的坚毅，更需要付出两倍、三倍，甚至还要多的努力。然而，一位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给我讲了他的一首自鸣得意的诗作，全诗虽早已忘却，而末句关于凤凰涅槃的用典，恍兮惚兮，让我看见了凤凰冲出烈焰的风采。

20 世纪 80 年代初，历经劫难的中国人开始铺设通向他们自己的小康之路，人们一改对自身价值追求的标准，一切向前看潜移而为一向钱看的自嘲。各阶层、各行业的冒险家纷纷下海，以各种合法的、非法的，道德的、非道德的方法，或者为了生活的稍微富裕一些，或者想在商海中捞取个金娃娃。而我却放弃了原本可以先富起来的职业，走上了一条充满太多幻想，侈谈人生，枯寂而又贫穷，朝乾夕惕而又漫长无尽，即所谓终极关怀的学术之路。

在那远离生活主流的日子里，我曾以三四倍于月薪的代价，购得收录机一部，倘佯于字母、音节的游戏之间；也曾花掉两年时间，由大专起点，取得了英语本科学历；几乎在同时，我还自学了日语和法语，因为它们对于我的新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日后也省去了我许多的麻烦。在那段日子里，医学院附属医

学长，还是学弟，年龄大多小我一轮，中年老女重作新妇，得来实属不易。张先生有教无类、唯才是举的气度，以及对我的宽容与厚望尤其不能辜负，所以三年的学生生活，夙兴夜寐，朝乾夕惕，不敢稍有懈怠。一千个日日夜夜，既不闻雁塔钟声，亦不见灞柳飞雪，破晓前便从梦中醒来，万籁俱静的深夜才在英语的播音中恍然入梦。触目皆是者书，举手可及者笔和纸，满脑门子的问题，以及无数次被推倒的假设与千百次的求证。因为我深知学术上孤陋寡闻而又耻于人后的我，首先应当记住并实行笨鸟先飞的古训。张岂之先生对我有“勤于读书，勤于动笔，勤于思考”的评语，或许正是对我这先飞的“笨鸟”所作的肯定性结论。每年的寒暑假，我都拖着一小车的书，往返于陇海线上。来去匆匆，拥挤的车箱中常常找不到座位，只有靠在椅背上，双腿交替，金鸡独立式支撑过潼关，支撑过洛阳。曾记得，一个酷寒的冬夜，火车上塞满了急于回家过年的游子，好不容易挤上车的我却找不到立足之处。大概是那两节车箱连接处的窗玻璃被打破的缘故，破窗而入的寒风逼走了每一个人，我才得以和我的书驻足于东归的车上。然而，难以抵御的寒冷似乎剥去了我身上的棉袄，只好不停的蹦跳着，熬过了那十余个小时的漫漫长途。多少年过去了，至今我的脑屏上总能映出自家返校、夜幕长安的每一个细节：月色朦胧，灯光点点，拖着一摞子书和随身物品，摇晃且长长的身影，落在脏兮兮的柏油路面上，缓缓行进在万籁俱寂的古城墙下；偶然碰到深夜拉客的三轮，听到一两声怀春的猫鸣；当钟楼的阴影留在身后，到达朱雀门或小南门内，才有起得太早的生意人，正在点燃的早餐的炊烟；来到校门，不忍叫醒还在大锁锁着的铁门内酣睡未醒的门卫，只待一个小时后，我才披着晨雾，钻进宿舍，打开收音机，听着 English 的教学节目，迎来又一个黎明。

也曾记得，三年中有两个除夕是在好心的、当然也是急着回

位。两年以后,《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以其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新内容而受出版界观顾,并以上、下两卷在台湾出版发行。

我很留恋西北大学的古朴与典雅,毕业后留校任教。在那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校园里,很容易就让我选择了同样冷僻、玄奥,很少有人问津的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尽管经费寥寥(仅2000元),但汤先生的宏廓、深邃、中西文化厚重的学养,以及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淳儒风范,却教我乐此不疲。所幸得汤一介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在经历了又一段书海漫游和勤苦的笔耕之后,于1993年,《汤用彤评传》问世。该书以考据、比较、综合的方法,通过对汤氏生平、学术的条分缕析,展现其中印文化接触、冲突与调和的历史观念,着重强调不同文化趋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一步指出因革损益、并览今古、中西互补、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发展态势。把佛学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导致当今社会冲突与振荡的整个文化领域。同时,由佛学进而经学、子学、中西文化交流,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学术三大块研究的整体规模。如果说《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侧重于学术思想在社会变革中历史作用的话,那么,《汤用彤评传》则凸现了不同传统的文化渗透与互补、包容与趋同的现实意义。有趣的是,这本书写作于西安,脱稿于郑州,后记于海南,两次出版却是在我落脚于“湖湘”之间的事了。

1992年底,我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孕育我学术思想的母校——西北大学,自郑州大学辗转而至新建的海南大学。当时,南下之风吹得正猛,琼州海峡塞满了跨海“淘金”的人流。然而,那里人人都欲抱个金娃娃的商品意识,和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而为暴发户的“七彩世界”,与我的学术追求极不相能。老板在灯红酒绿中的一次次宴请,校园里时装表演以及为此推波助澜的流行音乐搅碎了宁静的夜,使人心都变得骚动起来。但那里的

椰林没有留住我，海水也不能挡住我北归的路。10个月之后，我接受了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的邀请，在9月5号的黎明，悄悄地离开了那个叫人眼花缭乱的乍起的城市，来到近代人文荟萃的麓山脚下。《光明日报》为此以大字标题，道出了我内心的呼唤：《学术是学者的生命》！强调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学者尤其应当心如壁立，献身于理论建设和育人的百年大计之中。这使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数年来教学南北，常针对现代人对宗教的偏见和重物轻人的社会导向，一则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二则对宗教予以学术性的阐释。众所周知，作为培育人的德性和技能的教育事业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前进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生产工具的生产、再生产，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再生产。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只是生产技术和物质享受的现代化，主要的还是人的现代化。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不言而喻的道理，却往往被耽于物质享受的现代社会所忽视。这些话固然是老生常谈，然而，生不满百，却怀千岁之忧，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易之本性，藉此表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前途的一点忧患罢了。

至于宗教，我是把它划在与教育同类的人类自身的生产、再生产的范畴。它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一样，从本质上看，都是立足于扩展人的有限性，逐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和大自然的无限，只不过宗教更注重内在心性的扩张和道德的涵育，塑造勇于任事的责任心和进取精神，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的高尚道德情操罢了。而佛教在中国的移植和嫁接不仅重铸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影响并浸渍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审美观念，尤其直接体现了不同文化在排拒与吸引、包容与渗透的历史过程中，文化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昭示了中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方向、中西文化的互补与

趋同。

事实上，正是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在学理和现实生活中的亲和，触发了我对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研究的兴趣。如何评价传统，如何引介西学，如何建设中国文化的未来，无疑是中国学术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主要课题。而古今中西，皆可从佛教中国化及其在近代入世转向中见其端倪。1995年，我带着这个问题走出了国门，希望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察它的长和短，探究现代文化因革、互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996年4月，历经四年，完成了我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一年后出版发行。全书51万言，集中论述了一个观点：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应当说明，这一成果是建立在前人、今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但并没有因循前人的道路和已成之局。其一，我继续博士论文中佛学二次革命，宋以后不是衰落，而是高层次全面渗透的观点，用95%以上的篇幅，论述近一千年来禅宗思想与理学、心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乃至“帝王之学”，以及逻辑实证、直觉体悟等方法的会通、渗透及至融合，探讨它与当时主流文化、社会思潮的亲和与互动；其二，追循原始，考证“禅”名之嬗变，以文字考校和思想变迁的历史事实，指出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得惠于庄、老，亦成就于庄、老；其三，六代传宗，上追达摩，或谓领宗得意之中兴，或谓破斥名相的《金刚》对《楞伽》之革命，我原也以为信史。然而，达摩之学既非大小乘禅观之说，语似婆罗门外道而近《奥义》之理，“定”的追求又同以双遣为特征、超二元对立的慧观哲学大相径庭。况且，佛法初来，“禅”经创造性翻译，早已流行于汉魏，慧皎以庄老解禅，也当在菩提达摩之前。《坛经》之创，基于《南华》，而承于道生、僧肇诸大德之后，是庄老的哲人之慧，而非僧人定心修身之法。所有史实的考察，又迫使我走上了一条原本无路，或者说遍布荆棘的无路之路。与所有的评论不同，一位美国学者专

借公众聚会的一方宝地，在讲述中国文化的同时，也介绍一些佛理。那在说清与说不清之间的形上之学，还是让那些谦称我的“学生”的朋友们如“醍醐灌顶”。临别眷眷，诗、歌难以尽意的语言，为我送行；还有对联一副，教我常念故人：“释儒佛，讲道（应为老）庄，弟子众生；知古今，晓中外，诸子百论。”溢美之辞，虽不敢当，殷殷情意，却之不恭。至今想来，也难免不为之怦然心动。不过，从另一方面我也得到了一点启示。一个来自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的博士生听了我的讲座后，也曾感慨万端地说，应当让我到台湾去讲讲，可以冲击那里的一些神气和鬼气。她的话说明，在佛教文化领域内，或者说对佛教文化的理解，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还存在着某些错误的认识和背离佛家宗旨的倾向，还需要理论上的阐释与正确的引导。

归国前，应神交已久的朋友之邀，长空万里，飞越北美大陆，赴加拿大交流。在温哥华，与梁燕城博士有一番关于禅宗与基督教的对话，涉及中西文化理性和实践的许多深层次的思考。我们又驱车两千余里，穿越落基山脉的雪山、丛林，而至阿尔贝特（Alberta）省首府爱蒙顿（Edmonton）。这个省以盛产石油著称。Alberta 大学建筑别具风采，楼楼相连。学生足不出户，便可从事学校生活的各项活动。爱蒙顿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商场 mall，横跨九条大街，着实让人叹为观止。我和这个大学的教授以及其他各界朋友同样作了学术交流，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涉及佛学，也收到些许开启耳目的作用。

匆匆一年，为完成自我规制的四项指标（专题研究、计算机应用、社会调查及英语提高），常怀惶恐，临行之际，倒有一点不虚此行的欣慰。也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了。

有趣的是，在马里兰大学国际书法教育会议上，我接待了一位来自西安的书法教育家。我陪他参观了华盛顿 D. C. 的一些名胜和著名博物馆。语言之间，知是近在咫尺的乡亲，且先后在

未取到。是第二天他第二次再去才取走。这事我真得感谢他。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竟如此不嫌麻烦为我办了这件事。我想写信给他，除感激外，还想请他如真是有志于新闻学，可继续研究，并拿出成果。你们那里不是有新闻研究所吗，是否可以对这位社会上的有志者，助以一臂之力，使其有成，也许可以飞出一只凤凰来。（其余略）惜分，六月十五日。

第122封信(2004年2月5日) 继兴：你一月三十日信收到两天了，邮递员亲送到我家中，他不小心把信撕坏了，我急忙用透明胶条贴起来，才算看清。你说那件“实在了不得”的事，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一点想不起来，我果然有托人送给你四本书的事吗？想不起来，我甚至不知道你和麻天祥认识，我的忘性可称天下第一了。你却记得如此清晰，我倒应来个“实在了不得”。八个月前，我给重庆一友人写了一首《慎独之歌》，这个独字她竟不认识，她把这首似诗非诗的小品发表在刊物上，成了《慎之歌》，但影印之作却有我原“独”字在。内中有两句：“人惠于我，不可忘也；我惠于人，不图报也。”也许这就是我送你四本书而不记得的原因罢。麻天祥的功力，我倒是永不忘的。他找过我几次，先是要考博于我名下（不是门下），我几次闲谈，发现他外拙而慧中，甚为欢迎，但人大校方因为他原学医学，专业不对口而拒绝，我大不满，无可奈何。他乃改而去西北大学考张岂之的历史学，竟成大器。他从美国归来，曾来我家，后来又送给他所著《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我对任何宗教从来不研究，至今未看。你不来信，我竟不知道他写了那么多书。有几年不联系了，他不是去了湖南师范大学吗？何时到了武大？我对他，现在仍抱恨不已，他是个人中之杰。类似他的情形，我还经过二位，差点误了人家一生，将来有机会再细谈。教育制度非改不可，不尊重教授本人意志而弄几个条文限制才能，真是可恼之

至。麻天祥可谓个人奋斗，出人头地。你不必惭愧，你不是同样大有成就吗？我也为你而骄傲。惭愧的是我，至今一无所成，小文小块，清水一杯，不值一提。《炎黄春秋》近期要发表我三文，你有空可翻翻。用毛笔写信，万请勿忘。

王继兴 河南原阳人，1940年出生。北京大学新闻研究班毕业。退休前任《河南日报》高级编辑、《大河报》总编辑兼《漫画月刊》杂志主编。社会兼职有全国省级晚报（都市报）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都市报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客座教授、黄河科技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河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杂文学会会长、河南省老年摄影学会副会长、河南省新闻美术工委主席、河南省书画院特聘顾问、河南省东方书画院院长等。出版的著作有《编报余墨》、《黄叶集》、《萍踪感悟》等，主编出版的书籍有《记者的多维思考》、《共和国历程中的100件大事》、《大河新闻潮》、《策划制胜》等。1991年获首届中国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奖。其新闻传略编入《中国报界知名编辑记者辞典》、《高级记者高级编辑名录》。其书法作品和艺术传略编入《集行草字典》、《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世界当代书画篆刻家大辞典》、《世界当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中日现代美术通鉴》、《中韩书画名家大辞典》、《中国书法全集》等。1995年应邀赴日本进行书法艺术交流。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为学与为人》编辑写在《五十知天命》前的导读

笔者小时候常爱观赏蚂蚁，久之，发现有一种蚂蚁最后能长出翅膀飞上天空。那时，笔者常想，人最后为什么不能长翅膀呢？由于历史原因，笔者没能升学，固然也成不了动物学家。蚂蚁是否长翅膀只能让那些动物学家回答去了。随着岁月的流